

● 考古与文博

西阴时代:中国文明的滥觞

余 西 云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余西云(1964-),男,湖南临湘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前考古研究。

[摘 要] 西阴文化发端于陕晋豫交界区。鼎盛时期控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西阴文化在其扩张过程中瓦解了固有的文化格局,造成了诸多族群的重组与融合。其以绚丽多姿的彩绘“花”纹为旗帜,开启了“华”夏族群浩荡洪流的先河。西阴文化晚期,传统的家庭模式趋于瓦解,社会的层级化已然显现,私有观念逐步形成,成为中国文明的滥觞。

[关键词] 西阴文化;文明起源;滥觞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6-0696-05

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学术界对此可谓众说纷纭,主要涉及到文明的标准、文明起源的时间、文明起源的机制与模式等。我们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某一点上的一个事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西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000~3000年)在这个过程中处在非常关键的位置。

西阴文化以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命名^①。过去学术界也将这类遗存归入仰韶文化,称之为西阴类型或庙底沟类型。后来还提出过“庙底沟文化”的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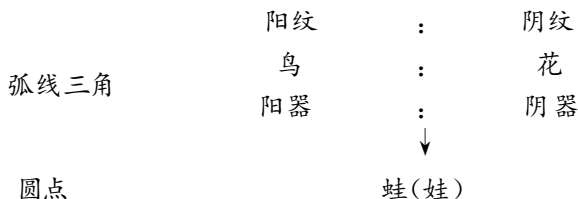
典型的西阴文化遗存的陶器以盆、罐(瓮)、瓶、钵(钵形甑)为大宗,另有少量的釜(釜形鼎)、灶、杯、器盖与器座。陶质可以分为泥质和夹砂两大类,泥质陶占绝大多数。陶色大体分为红(褐)、灰两大类,前者占绝大多数。纹饰以素面为主,线纹较多,有少量弦纹、附加堆纹等。

西阴文化的彩陶相当丰富,特征非常鲜明,是其典型特质之一。彩绘的颜色,以黑彩为主,红彩很少见。绘彩前往往在陶器上施红色或白色陶衣。彩绘一般施在细泥红陶器上。彩绘主要施在器腹外侧上部,也有少量绘在折沿盆的口沿上。

彩陶的构图尽管相当繁复,但其使用的绘画语符却相对简单。彩陶所使用的绘画语言可以分解为弧线三角、圆点、线条这样三个最基本的语素。三种基本语素互相结合,形成多种不同的语符。这些语符可以归纳为三类:阳纹弧线三角、阴纹弧线三角和圆点。其中弧线三角与圆点形成对比,阳纹和阴纹互衬。从某种意义上说,彩陶几乎均可以从阳纹和阴纹两个角度来观察,而这种互补的观察对于理解西阴文化彩陶极为关键。

鸟和花可以理解为男根和女阴,或者分别代表了阳具和阴器。这不仅具有一系列其它佐证,而且西阴文化彩绘本身也正好以阳纹和阴纹分别表示两类不同图案。图案表现手法的阴阳互衬,与反映内含的阴阳对比,可谓匠心独运。蛙与一些南方方言中的娃音同形近。以蛙来象征娃,大概与蛙和幼儿姿势的相似性有关。

西阴文化彩陶基本语符的表现手法、含义和隐喻, 可以图示如下:



西阴文化彩绘运用点、线和弧线三角这样几种经过高度概括的绘画语素, 采用了阴阳反衬的手法来表现鸟、花、蛙等几种主要的语符, 使用了叠加、连环等技法, 来表示求爱、交配、孕育和生殖等内容。彩绘的中心主题是生殖(崇拜)。

西阴文化陶器上的彩绘是其鲜明的文化标志, 几乎所有的西阴文化遗址中都有彩陶存在。在西阴文化影响所及之处, 也都有其身影。苏秉琦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论到西阴文化的彩绘“花”纹与“华”人族群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②。

目前学术界对西阴文化的起源有不同的意见。学术界的讨论主要涉及到半坡文化与西阴文化的关系, 其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张忠培、严文明两位先生在《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一文中提出“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 并且以一个中间链环把两个类型连系起来”的观点, 即西阴文化是经“三里桥仰韶遗存”、下孟村 F1、F2 这类“中间链环”从半坡文化发展而来^③ (第301-305页)。另一种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 认为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即西阴文化)“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主要表现在饮食炊盛器皿的基本形式和彩陶花纹上)。其原因大概主要由于两者文化渊源不同”。“两者具有不少的共同因素或共同之点, 这应该由于: 两者大致同时, 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和阶段, 两者主要都分布在关中, 邻境交错, 联系密切。”^④ (第51-82页)

关于西阴文化的形成, 基于如下几个主要事实: 1. 西阴文化的核心内涵与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共性; 2. 典型西阴文化之前, 往往有相当于半坡文化史家类型第Ⅰ期的遗存存在; 3. 西阴文化与史家类型遗存在诸多单位共存; 4. 西阴文化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大体上与后冈一期文化及其变体重叠; 5. 西阴文化的重唇口尖底瓶可以看成是后冈一期文化内折唇壶的口沿与半坡文化的尖底瓶器身相结合的产物。

我们大致可以推断, 西阴文化的文化基础是半坡文化; 族群基础是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是后冈一期文化系统与半坡文化系统在反复碰撞的过程中, 经过融合、重组形成的。后冈一期文化与半坡文化接触、碰撞、争夺的前沿可能就是晋西南、豫西北至关中东部, 这里应是西阴文化的原生区。豫中、汉水中游、河曲地带的西阴文化可能不应该理解为西阴文化的传播, 或伴随着扩张而进行文化涵化的结果, 可能是基于共同的血缘联系而产生的文化认同。关中西部、汉水上游、渭河上游地区的西阴文化可能是西阴文化受到内部的人口压力和来自东部的文化压力, 向西拓展的结果。西阴文化这一起源过程显示出其为诸多人群的融合的结果。

西阴文化本身的空间分布有一个过程: 第一阶段, 与西阴文化有关的遗存, 主要分布在陕晋豫交界区, 汉水中游也有分布。这一阶段的遗存带有浓厚的半坡文化色彩。第二阶段, 西阴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西(陕晋豫交界区)、东(郑州左近)、南(汉水中游)、北(河曲地带)这样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第三阶段, 西阴文化空间结构延续上一阶段而来, 所不同的是其分布范围有进一步拓展。西阴文化的触角进入汉水上游和渭河中上游; 桑干河流域也向西阴文化转化; 嵩山周围地区成为西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第四阶段, 西阴文化除延续了上一期的分布, 主要的变化是渭河中上游成为西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晋中也成了西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西阴文化的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陕晋豫交界区为核心, 郑州左近(嵩山周围)、汉水中游、以关中西部为中心地区(包括陇东和汉中)、河曲地带、晋中环绕展开的态势。第五阶段, 郑州左近、河曲地带的遗存有了质的变化; 在陕晋豫交界区, 文化内涵变得简化, 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关中西部的西阴文化遗存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化的空间结构大体以关中西部为中心展开。西阴文化形成时构筑的空间模式被彻底瓦解。

西阴文化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曾对广大地区产生过不同形式的影响。西阴文化的扩张导致了一系列文化的分化、瓦解、重建或重组。西阴文化影响所及,留下了或多或少特质,烙下了或轻或重的印记,从而为它所处的时代打上了鲜明的标记。

西阴文化在其扩张过程,影响了广大地区的文化,但其影响的模式是有差别的。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1.西阴文化向东北方向的推进,主要表现为直接嵌入的模式。西阴文化经张家口地区进入西辽河上游,在这里形成了红山文化。虽然红山文化包含有多种中原地区文化的因素,但如果我们将红山文化的出现置于西阴文化生成和扩张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就不难发现,西阴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2.在太行山东侧形成的大司空文化基本上应该看成是西阴文化扶植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其具有浓厚的西阴文化色彩,但毕竟另有渊源。大司空文化与西阴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反映了西阴文化对豫北冀南的控制。3.西阴文化向长江下游的扩张,大致呈现出与大汶口文化竞争的态势。其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化重组。长江下游这一时期遗存的主要陶器组合是鼎、豆、壶(罐),这一组合与西阴文化的差别颇大,也与这一地区早期的马家浜文化不同。这一器物组合与黄河下游的文化较为接近,大体上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系统向南扩张后生成的。西阴文化的势力可能一度达到了大别山东麓,影响及于长江入海口附近。西阴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争夺,西阴文化虽然处于主动位置,但从最终的结果看,大汶口文化似乎更占上风,长江下游诸文化基本是以大汶口文化为蓝本重组而成。4.西阴文化对长江中游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辐射,而不是直接的介入。西阴文化的因素见于这一地区的几个文化中,但没有典型的西阴文化组合在这一地区出现,也没有从根本上中断这一地区的文化传统,甚至没有改变这一地区的文化格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阴文化还是对这一地区的文化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使它们的文化面貌,甚至文化性质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转换,形成新的文化阶段。所以,我们认为西阴文化向长江中游地区的扩张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传播或涵化。5.西阴文化向外扩张的方向首先是向东北方向经营,并控制太行山东麓;其次是向长江中、下游推进。长江下游地区是西阴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角力的结果,最终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从这一过程看,西阴文化的扩张基本呈现出一种对黄河下游围攻的态势。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西阴文化扩张的最终目的正是在于与黄河下游文化之间的竞争。

大体相当于刘林期后,西阴文化对大汶口文化有比较强烈的渗透,典型的西阴文化因素(主要是彩绘)进入大汶口文化,并以鲁西南为桥梁,深入到胶东及辽东半岛南端。但这些因素在大汶口文化中的出现基本上是在相当于以野店二期为代表的遗存之后。西阴文化似乎并没有参与刘林期遗存的生成。也就是说它虽然一度对大汶口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似乎并没有触及大汶口文化的根基。反观大汶口文化,在接纳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后似乎更显活力,为下一阶段的发展与反攻积聚了力量。

大汶口文化是所谓东夷文化的代表或前身。西阴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竞争正反映了古史提到的“夷夏之争”的一个阶段或前身——或者准确一点可称之为“华夷之争”。

从西阴文化的扩张和收缩过程看,其在不同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扩张和影响模式,显示出复杂的政治谋略。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扩张模式与此前和以后很多文化不同,倒是与后来西周文化对外扩张时显示的多种多样的模式有同工之妙。

大体在距今5500年稍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兴起。良渚文化开始向北扩张。受良渚文化的压力,大汶口文化退出了苏北地区,转而向东、北扩张,并把向西作为经略的重点。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沿淮河流向豫中推进,瓦解了当地的西阴文化,并在其基础上生成了西山文化。随后豫北冀南的大司空文化失去了西阴文化的屏蔽之后也颓然崩溃,大司空文化的因素溶解在华北广大地区诸新文化中。大汶口文化向西,在河曲一带生成了庙子沟文化;在汉水中游生成了朱家台文化。同时大汶口文化经河曲与甘青地区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至此,大汶口文化已基本完成了对西阴文化合围。在这一背景下,关中东部的西阴文化蜕变为西王村类型,而关中西部的西阴文化逐渐向福临堡二期遗存转化。西阴文化就此土崩瓦解。

西阴文化的聚落形态对我们理解这一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尤有意义。从房屋建筑看, 西阴文化早期多圆形单间房, 同时存在方形单间房。晚期以后, 在郑州附近、南阳盆地、汉水中游等地区开始出现方形多间房。这种多间房的出现应该不仅仅是建筑技术进步的结果, 更主要的是社会需求的产物, 是家庭形态发生了变化的表现。圆形房逐渐被淘汰也许正是因为它不具扩展的潜力。从单间房到多间房, 反映了家庭规模不断扩展的趋势。这些多间房内往往都有不止一处灶台, 有的每间房分别有灶, 甚至一间房内有几个灶台, 表明这些住所联系在一起的人, 经济上相对独立。许多双间房或多间房的门向并不一致, 有的似乎是刻意形成差别, 说明这些房间的居民有相对独立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假定一个灶台代表一个核心家庭, 则从单间房到双间房到多间房到排房的变异, 大体反映出以核心家庭为基础, 主干家庭、扩展式家庭、家族依次生成的过程。家庭规模的扩展表明人们对血缘关系的亲疏变得敏感了, 对自己亲一些和疏一些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这与早期的情况形成对比。

贮藏坑与住所的关系也有相应变化。在早期, 住所与贮藏坑往往是分立的, 在住所之外往往有许多用于存放东西的“灰坑”。到中期以后, 在汉水中游和郑州地区, 随着多间房出现, 户外的“灰坑”减少了, 住所内往往有用于贮存的空间。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表现得一清二楚。

近年在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属于西阴文化的城址, 有保存相当完好的城垣、大型夯土台基和众多的中小房基以及墓葬和窖穴^[3] (第4-15页)。

西山城的出现与当时这一地区面临来自东面的文化的威胁应该有关。这种大型工程的建设, 说明少数人能调动大多数人的劳动, 表明社会已经分层。

西阴文化晚期, 陕晋豫地区成为西阴文化的地理中心, 而郑州地区、汉水中游、汉水上游、渭河中上游、河曲地带、晋中等地的西阴文化环卫其外。在当时的西阴文化聚落中, 至少存在这样3级结构:

文化中心(位于陕晋豫交界处附近, 庙底沟可能有其部分功能)



区域中心(类似西山)



一般聚落

西阴文化聚落形态所揭示的变化, 可以《礼记·礼运》中的这段话来理解: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 天下为家。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 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仪以为纪。……是谓小康”。

2000多年以前的这段文献描述了所谓小康社会(可以理解为文明社会)与大同社会(前文明社会)的种种区别, 这些差别与西阴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是相当吻合的。西阴文化的聚落形态所展示的家庭结构和财产观念的变化, 为这段文献中的某些说法, 如“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与“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与“货力为己”等, 做了生动的注解。文献中特别提到的小康社会具有的“城郭沟池以为固”的特征也得到了新发现的西山城址的印证。

西阴文化发端于陕晋豫交界区。鼎盛时期控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 东起豫中平原, 西至青海东部, 南自汉水中游, 北达河曲地带。影响所及更是东越渤海, 南抵长江之滨, 北逾燕山之阴, 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西阴文化在其扩张过程中瓦解了固有的文化格局, 造成了诸多族群的重组与融合。其以绚丽多姿的彩绘“花”纹为旗帜, 开启了“华夏”族群浩荡洪流的先河。西阴文化时期, 传统的家庭模式趋于瓦解, 社会的层级化已然显现, 私有观念逐步形成, 成为中国文明的滥觞。

注 释:

- ① a. Lic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Feng River Valley, South Shansi, China", 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No. 78: 7, 1927.
中译见于: 考古, 1983, (8).
又见于《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b. 李 济.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 1927.
又见于李济与清华. (李光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三晋考古. 第二辑(杨富斗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c. 李 济.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 李济与清华. (李光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d.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 三晋考古. 第二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 ② 代表性的文章是: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 1987, (9).
又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参 考 文 献]

- [1] 张忠培, 严文明. 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J]. 考古, 1964, (6).
[2] 苏秉琦.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 考古学报, 1965, (1).
[3]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 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J]. 文物, 1999, (7).

(责任编辑 桂 莉)

Xi Yin' s Tim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U Xi-yu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U Xi-yun (1964-),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N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The Xi Yin Culture (ca. 4000—3000 B. C.) originated at the juncture area of Shaanxi, Sh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In its great prosperity the Xi Yin culture spread to the large area of central part of China. It laid the space foundation of China before the Qin Dynasty (221—206 B. C.). Within its expansion, the Xi Yin culture disintegrated original cultural structure and form and led to fusion and regrouping of many peoples. It became the majority part of the Hua people. In late period of the Xi Yin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family model had come to disintegrate; the new family model appeared;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had gradually formed, and the concept of private ownership had come into being. All these changes became the beginning symbo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i Yin culture; civilization origination